

ZHONGGUOWENHUANIANBAO

● 李君才 孙树志 马玉霞 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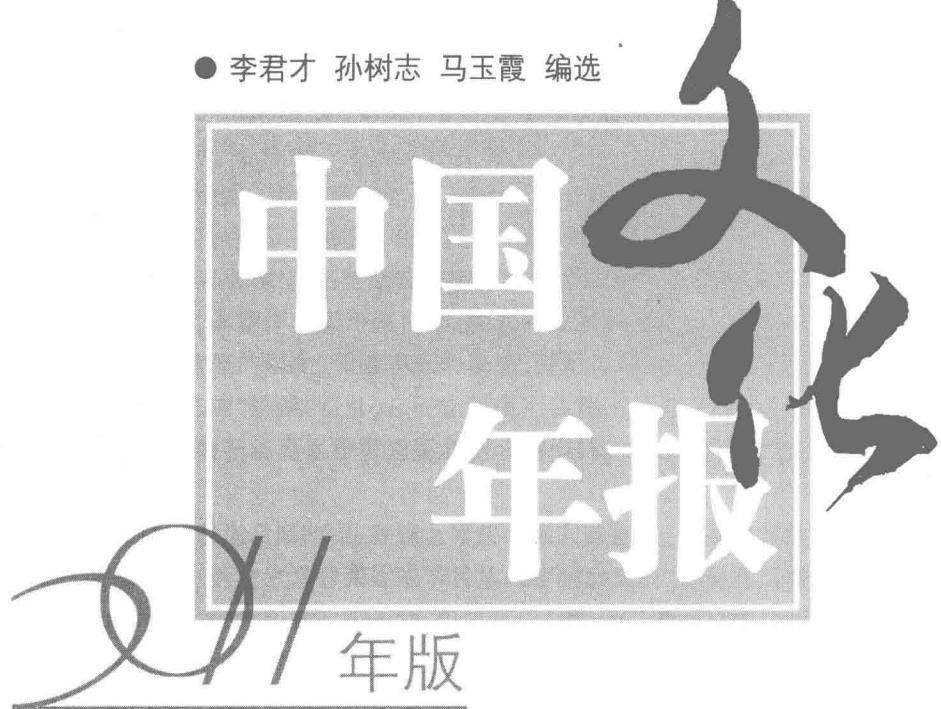


- ★ 文化与人生
- ★ 文明的痛苦与幸福
- ★ 重说道德
- ★ 把命照看好 把心安顿好
- ★ 微博的历史、现状及未来
- ★ 中国你慢些走，等一等你的灵魂



兰州大学出版社

● 李君才 孙树志 马玉霞 编选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年报:2011年版/李君才等编选.一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311-03742-0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文化—中国—2011—
报 IV. ①G12 -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6623 号

243829

责任编辑 钟 静

装帧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中国文化年报 2011 年版

作 者 李君才 孙树志 马玉霞 编选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426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742-0

定 价 3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出版说明

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经济形势十分复杂的一年。受欧美债务危机冲击，在国内物价上涨压力较大、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们坚持既定宏观调控方针，在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中寻求平衡，既有效遏制了物价过快上涨，又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民经济运行态势总体良好，区域、城乡、内外平衡状况有所改善，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经济增长小幅下降，物价涨幅见顶回落，文化及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也暴露出了一些深层次矛盾，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面对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潜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我们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持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社会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为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时代造就了年报，年报记录着时代。“中国年报”系列丛书秉持“浓缩信息精华，关注改革发展，梳理学术脉络，传播思想文化”的宗旨，采用专题结构形式，荟萃年度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和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以集中审视读者所关注的各领域重大课题及其变化趋势，年年给读者提供系统而又丰富的信息资料和深入研究的参考坐标。在年复一年的积累中，

“中国年报”系列丛书以鲜明的纪实风格、系统的文化内容和一流的编印质量，日渐成为具有强大信息辐射力的文化精品，在学界、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2011年版“中国年报”系列丛书一如既往关注年度内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领域的主要事件、主要观点、主要政策和主要举措，试图较为系统地梳理各领域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2011年版“中国年报”丛书共六种，分别是：《中国经济年报》，由曹子坚等编选；《中国政治年报》，由沙勇忠等编选；《中国文化年报》，由李君才等编选；《中国社会年报》，由陈文江等编选；《中国教育年报》，由王根顺等编选；《世界政治经济年报》，由张新平等编选。

收入丛书的文章是编者从2010年至2011年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数千种报刊中精选出来的。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既有高层决策者，也有普通老百姓；既有外国知名人士，也有港澳社会贤达。被选入丛书的文章，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各位作者在有关领域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或许也不能完全反映年度内知识界对相关问题的权威阐释，但它们都传递了对这些问题的最新思考，都是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论证有力并具有很强可读性的好文章。

为了使文章内容更加洗练，观点更加突出，避免背景介绍方面的重复现象，编者对部分文章做了删节或摘要，有的甚至对标题也做了改动，在此恳请原文作者的谅解。因为编者和作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传播知识，服务读者。

为表示对作者创造性劳动的尊重，我们将向文、图作者奉寄转载稿酬，恳请作者与我们联系，告知您的通讯地址。尤其是所采用的少量图片、漫画，由于原报刊上未能注明摄影、创作者，希望这些摄影家、漫画家也能与我们联系。同时，为了提高“年报系列”丛书的内容质量，扩大选稿范围，真诚欢迎学者、专家及各阶层读者为我们荐稿，一经选用，即付酬致谢。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邮编：730000

电话（兼传真）：0931-8912613

E-mail：press@lzu.edu.cn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目录



导论：时代呼唤人文关怀

重组 / 058

-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 / 002
- 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 009
- 文化与人生 / 014
-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俞吾金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 023
- 辛亥百年：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
——专访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 / 079
- 重说道德 / 069
- 人心是怎么变坏的？
——专访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 / 079
- 阶层固化、社会撕裂：中国还有救吗？ / 082
- 以真共识求得大和解 / 088

道德重建：寻找文明发育的动力

- 红色文化空壳化忧思 / 061
- 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精神 / 063

社会心态：社会现实的折射

- 抱怨一族与文化转型 / 094
- 焦虑渐成社会普遍心态 身边危机四伏令人不安 / 097
- 「弱势心态」蔓延：矫情还是憋屈 / 100
- 「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 103
- 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 104

红色记忆：坚定面向未来的信念

- 20 世纪 20 年代的信仰：救国救民
一个『急』字 / 049
- 变与不变：相隔 90 年的青春对话 / 051
- 红色经典 岁月流金 / 054
- 《建党伟业》：红色记忆的拼贴与

影视评论：顺势而为 乘势而上

- 谁是中国最幸福的人 / 107
 - 中国也正面临幸福追求的转型 / 111
 - 幸福八问——四位知名学者谈幸福 / 116
 - 何为好生活——论后神学时代的好生活问题 / 120
 - 什么是幸福 / 127
 - 养志与乐生：中国人的幸福观——汪涌豪教授在日本冈山『东北亚的幸福观』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 / 138
 - 把命照看好，把心安顿好，人生即是圆满 / 143
-
-
- ## 文学观察：在质疑声中突破
- 『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 / 148
 - 诗歌观察 / 156
 -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 / 164
 - 如何现实，怎样思想？——关于当代中国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 / 240
- ## 学术论坛：从『自觉反思』到『文化自觉』
- 从『娱乐』到『傻乐』——论中国大众文化的去政治化 / 209
 - 美学和文化视野中的『丑』 / 218
 - 批判性思维与思维基本功 / 222
 - 文化现代化：作为普世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 / 229
- 002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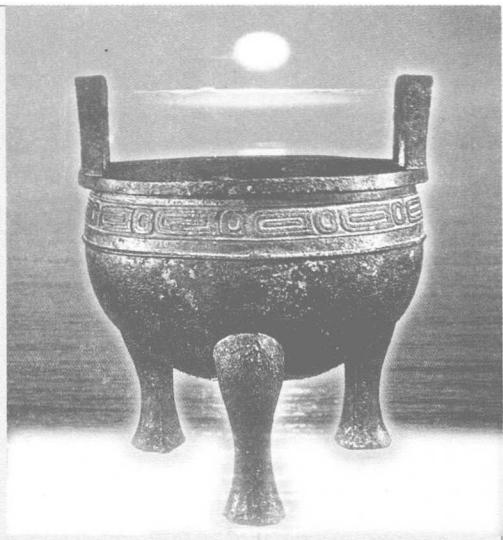


文化万象：剪不断理还乱，亦喜亦忧患

- 我们究竟怎样看待明星——吴敏研究员在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的讲演 / 290
- 与“唱红”不如倡导“新文明”——专访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 / 296
- 争议“唱红”：捧与骂的纠结——访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丁茂战 / 299
- 关注底层
- 打工文化，烛照劳动者精神家园 / 248
- 农民工《春天里》走红启示：给草根更大的舞台 / 252
- 管窥微博
- 超三成网友患上『微博疲劳症』 / 256
- 微博、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 / 259
- 微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266
- 穿越迷思
- 穿越：“让通俗更通俗” / 276
- 穿越剧：年轻人的情感旅游 / 277
- 穿越剧成“灾”：有的不过是躲避式快感 / 279
- 穿越文学热潮背后的思考 / 280
- 辣言辣语
- 都市『剩男剩女』现象解读 / 285
- 拼爹时代平凡父亲的心声：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儿子？ / 288

青春飞扬：成长进步中的新一代

- “90后”：被误读的青年一代 / 315
- 当代青年价值观如何重构 / 317
- 主流与边缘：从《非诚勿扰》看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冲突 / 320



导论：时代呼唤人文关怀

历史的长河将中华文化推到了21世纪世界文明的中心舞台。5000年文化的锻造，使中华民族必然肩负起人类未来新文化的责任。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历史逻辑的指引，只能表明我们的文化特质具有肩负起新的文明的潜能，而要真正担负起这种历史责任，实现人类文明新的飞跃，仍需我们作出巨大的努力来建设好我们的文化。

——刘云德

经济在快速发展，生活在不断改善，然而，人们活得好像并不那么自在。内心深处，让我们眷恋、产生归属感的某些东西正在悄悄地远去；血液之中，让我们感到温馨和踏实的某些元素仿佛正在慢慢地流失。新奇的事物应接不暇，恍惚不安的情绪总是挥之不去，人们在眼花缭乱中感受到单调，在热闹和喧嚣中品尝寂寞。我们究竟追求一种怎样的生活？我们究竟期待一个怎样的世界？

——孙家正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

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西方学者中曾有人断言：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当时，国人并不以为然，似乎以为是人家恭维我们，想和我们发展关系，要我们的市场，说说罢了。如今，我们在21世纪已经走过了一个年代。恍然间，一幅清晰的东方画卷呈现在世人面前。回望10年，好像中国的国运真的和什么千禧年、世纪之交有什么必然联系，中国人为之奋斗多年的梦想突然都在这个时刻实现了：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加入WTO，成功申办、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政治和社会保持长期稳定……那些唱衰中国的预言家们对中国的悲观预言都未出现。东方世纪的帷幕终于拉开了。

回想一下“9·11”事件之前的国际政治环境。当时的西方政治家们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受到鼓舞，把矛头直指中国。他们悍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在中国南海领空用侦察机撞击我巡航战机，预谋在我东部岛链布置导弹防御系统……他们大有胜券在握、一举成功之势。然而，就像一个巨人正当举起利斧砍向对手时，脚下的基石“坍塌”了。

“9·11”事件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冲突。早在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先生就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预言到这种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他还断言，西方文化不可能从这种冲突中自我解脱。解药只能在东方，在中国的文化。

汤因比先生绝不是一个武断的预言家。他倾毕生精力研究人类文明史，总结了人类史上存在过的33种不同的文明形态，指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必然前景，写成了12卷的巨作《历史研究》(1961年)。为了使人们方便了解，他在耄耋之年(1973年)将其巨著缩写成2卷本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和《历史研究》。前者概述了人类的历史，后者则是对人类文明史的哲学判读，句句箴言，语重心长。尤其重要的是，汤因比先生秉承西方，然而，他能超越文化的情感，立于哲学使命之高度，追随逻辑的轨迹将人类文明的希望之路指向东方。

今天，当我们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面对机遇与挑战，重读汤因比的《历史研



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形势，把握命运，从而肩负起我们所应有的历史责任。

文化与文明

认识并厘清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文化，学术界有无数个不同的定义。但其本质无疑是人类对自身周边世界认识和驾驭的能力。人类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摆脱自然界自己的原属族群，一步一步走向现代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有多长，人类的文化史就有多长。到今天，至少也有300万年了。

在这300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大多数时间是处在蒙昧时代，即一种原始文化状态。在这个阶段，人类文化的哪怕一点点进步，都会用去成千上万年的时间。直到有一天人类发现了火，人类的文化探索终于走出了漫长的黑暗时代。是火将人类带出了蒙昧时代，迈向进步的野蛮时代。将人类文化的这一个时间段命名为“野蛮”时代可能是由于在此阶段人类处理部落之间冲突的普遍暴力原则。

当部落生活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工具的发展，开始有了剩余产品，对剩余产品的占有使部落内部产生分化。这时，部落内部必须有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占有关系的规则。根据这种规则，一些人对剩余产品的占有，从而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和管理被全体人所认可和接受。这就是早期的制度文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人类的文化内容主要是针对自然界的，那么制度文化却是针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随着游牧和园艺社会向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过渡，人类的制度文化日益丰富，直到全面确立。我们把这种制度文化称为文化的文明形态。人类从私有制开始到国家形式的出现，实现了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实质上是从普遍暴力向有限暴力的过渡。这种有限暴力在一个文化内部就采取了统治制度的形式，如法律、监狱、政府统治和权力等，而在外部便成为以一系列谈判、条约的前提的战争。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在文明时代，人们习惯上把那些不遵守文明规则的人叫做野蛮人。

相对于300万年的文化史来说，人类的文明史还很短暂，用汤因比的话说“充其量也不过5000年”。文明的制度还很不成熟，人类还没有摆脱野蛮，这也可能就是人类今天文明冲突经常演化为暴力的主要原因。

东西方文化的并立

东方和西方的分界概念是由西方人提出的。早期的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都把地中海东岸地区称为东方(Orient)。随着征服的不断扩展，他们发现了更远的东方，于是就有了近东、中东和远东的概念。而在古代的中国，九州即天下，即世界。因此，中国文化几乎是在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自我生成的。从文化的对立形态来看，西方文化以地中海为其摇篮，涵盖了整个欧洲和西亚大部分地区。而东方文化则是由中华文化圈和印度文化所构成。汤因比先生在《历史研究》中也是这样划分的。而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则把整个伊斯兰教地区都从西方文明中划了出去。

本文无意回顾全部人类文明的历史，而只是从历史的重要线索中列出东西方文



化对立的主要元素,从而寻找当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1. 文化起源的并立

西方文化发展为文明形态,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由当时古埃及的尼罗河文化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形成其源泉。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古希腊人在爱琴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两河流域的文化和埃及文化,创造了古希腊文明,形成西方文明的主体,贯穿至今。

几乎与此同时,在东方中国的黄河流域地区,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部落集团统一中华,继承了有巢氏、女娲氏和燧人氏的早期文化元素,形成中华文化的源泉。后经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文化建设,一个与西方文明全面对立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在东方形成。

东西方文化在其早期的孕育成长中并不相关,独立发展,自成体系。以致后来成为两种全面对立的文明形态。

2. 轴心时代的并立

当一种文化中出现一批试图摆脱神话的束缚、探求世界的本原和人生价值的终极真理的思想家时,人类的制度文化就开始向精神文化升华,这是文明的真正始元,是思想和哲学的起始。

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巧合,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同时出现了一大批思想者群体。他们都是用观察、体验、推理和冥想的方法试图回答宇宙的本源、人生的价值、社会的意义和万物运行的规律这种至高命题。无论他们各自作出的答案有何不同,他们都对各自的文化进行了一次思想总结,并形成了一个指导各自文化后来发展的思想体系。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的最突出成果就是以亚里士多德为总结者的希腊思想体系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思想体系。它们各自成为东西方文化的精神核心。

3. 文字发展道路的并立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在文字上都发源于象形符号。在古埃及人面对700多个象形符号时,他们走向了一种抽象表达的方法,摆脱了象形符号的具象意义,从700个象形符号中抽象出一部分抽象符号,用其组合表达出新的符号意义。后经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改造和演进,形成西方今天的拉丁语系拼音文字。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文字形成过程和长期使用这种文字的习惯形成了西方人超强的抽象能力。

而在东方,同样是象形文字,我们的祖先在面对使用上的困扰时,尽管也对其进行改造、简化,形成了象形、形声、会意、转借等手法,但始终没有实现抽象的跳跃。中国古人十分勤劳地朝着同一方向不断造字,以至于把汉字发展成一个近三万个方块字符的庞大体系。可惜的是,我们汉字的最初原始状态的象形符号体系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已经是通过改造的非原始形态的象形文字。所以,我们无法推演我们祖先的文字变更的心路历程。找不到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走向符号的抽象,从而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把我们拨向了一条和西方人完全不同的思想轨道的原因。



应当指出,这个道岔非同小可。它在东西方文化对立中,尤其是东西方人精神层面的对立意识中起到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没有实现抽象,以至于中国人天生的抽象能力差。这方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表现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不管我们古代的科学家们有多么丰富的思想内涵,但由于缺乏抽象符号的表达,无论怎样的复杂运算,都只能使用方块字的繁复表达。读过《九章算术》的人都会感到这种表达方式多么严重地束缚了前人抽象思维的发展。

更惊险的是当人类进入信息技术时代之时,国内外的科学家们都曾惊呼在这个由小小键盘决定命运的时代,方块汉字怎么能跳过这个快速输入和信息化处理的致命难题。面对这个难题,我们要么放弃方块文字,要么被历史的快车抛下。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的科学家的努力下,这个难题还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

4. 信仰体系的对立

在人类文化实践中,人们对那些不可认识但又对自己生活和生产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自然力量产生了莫名的恐惧。长期处于这种恐惧的压力迫使人们对其作出理性的必然反应就是崇拜心态。这是对压力的一种屈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崇拜曾经伴随着人类文化长期发展过程。随着人类的思维能力特别是抽象能力的提高,人类使自己从一种与自然力对立的崇拜心态上升为一种与自然力融为一体信仰状态。在这种信仰状态下,原有的崇拜压力彻底消失了,自己因为与对象融为一体而感觉到了一种保护力。同时,因为与对象融为一体,自我便消失了。自由成为信仰和保护的代价,这就是所谓的皈依。

从人类的信仰实践看,从多神信仰到一神信仰是一种进步。西方文明在其发展中,再次展示其抽象精神能力的威力实现了从多神教的原始宗教到一神教的现代宗教的转化。而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中华文明没有实现这一跨越,一直把原始多神信仰体系带进了现代社会。

文明的冲突

文化的对立产生矛盾、斗争,而一旦到了文明的程度,就必然产生冲突。冲突的解决有时是暴力的,有时是非暴力的,这取决于冲突中文明的性质。

在西方文明中,最早诞生的一神教是犹太教,距今有近3000年的历史。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犹太教诞生的1000年后,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在遭受了犹太教的早期迫害和长达300多年的罗马帝国的压迫后,终于在公元392年被罗马皇帝提奥多西宣布为国教,并逐步确定了其在西方世界的独尊地位。

相对来说,伊斯兰教是一个年轻的宗教。在穆罕默德出生的公元570年之前,整个阿拉伯半岛还是一个松散的游牧部落民族居住地,处于早期多神宗教信仰中。穆罕默德在早年经商时游历了地中海东岸各地,接触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化。他40岁时成功地创立了伊斯兰教,并继而建立了阿拉伯帝国。他的继承者又把这个宗教帝国的版图迅速地扩展到阿拉伯半岛及西班牙、北非、印度和东亚的大片领土,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就这样诞生了。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三个一神教先后诞生，同时并存。一神信仰的本质特征就是把自己在精神上皈依于唯一的万能的创造了万物的神。这种唯一性就决定了排他性，视一切异己信仰者为异教徒，将之作为仇恨的对象。而这种仇恨会因为各种原因爆发为战火和屠杀。

不同的一神教，如果在地理上能互相隔离，在经济利益上互不交叉，那么，它们之间还可以相安无事。问题是这几个宗教从一开始就结下仇怨，都把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当做自己的宗教圣地。这种冲突终于导致了长达200年（1095—1291年），多达10次的十字军东征。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真正的宗教战争，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圣城被多次血洗，一命不留，片瓦无存。

十字军东征的结束，伴随着西方的文艺复兴和黑暗的中世纪的终结。之后的地理大发现，又使西方基督教找到了自己向更大的地理空间布道传教的机会，也为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找到了市场和殖民目的地。在随后的几百年，西方基督教经过新教改革使整个西方文化从理性走向科学，从科学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并把这种新文化作为普世价值推向世界。西方基督教文明在自身的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观方面采取开放进取的同时，似乎也采取了对异教的宽容态度。

然而，在西方文明的整体列车上，伊斯兰教的部分地区并没有得到同步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仍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从而为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便是造成西方文明内部新形势下文明冲突的死结。“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急剧下降”，“9·11”事件就是这种冲突的必然结果。10年过去了，问题并未解决。这期间，我们看到了西方文明为应对这种战争而出现的文化倒退。

汤因比的预言

西方文明内部的这种冲突，早在1973年就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预见到了。他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人类进入到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科学的进步把世界拉入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2)核技术的利用，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面临严重的威胁；(3)世界的资源走向枯竭；(4)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这四大变化使人类进入一个不可逆的全球化时代，进入一个命运与共的境地。这时候，人类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一个世界，要么全体毁灭。”

显然，世界需要大一统，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但这种大一统不是要通过消灭异己来实现的，而是要通过接纳、容纳异己，形成一个多元共存、和平共处的局面。而这种宽容和多元共存的文化精神，在西方一神教文化基础中并不存在。这就是西方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不可摆脱的困境。

根据汤因比的推理，能适应新世纪的文化只能来自于东方，能适应新形势的宗教只能是佛教，能为人类在新世纪寻找到新的文化起点的基础只能在中国，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

他说：“如果要使被西方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柔



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找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

他还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他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中国姗姗来迟的而又风险极大的社会试验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依然取决于非西方的神灵。”

汤因比为什么要将希望之光指向东方的中国，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呢？

他的解释是：“超工业化的西方生活方式和中国的生活方式都潜伏着自我毁灭的因素。西方方式是爆炸型的，中国方式——传统的中国方式——是固化型的。但是，这两种方式也都提供了让人们安居乐业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爆炸型的西方方式是充满活力的，固化型的中国方式是稳定的。根据历史上类似的发展情况看，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一种混合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那么西方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国的稳定恰当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将不仅使人类得以继续生存，而且还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宁。”

想象一下在1973年，中国刚刚同西方接触，汤因比就指出这一前景。它绝不是一种无端的猜测，它是对33种人类文明7000年历史综合考察的结果。同样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他并没有将这种希望指向当时的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原因就在于苏联在文化上仍属于西方文明圈，在宗教上属于基督教的东正教范围。

今天的世界正在沿着汤因比的预言精确地演绎着，日甚一日。

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历史使命

21世纪向世人展现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蓝图。在技术上它正在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地球村和统一大市场；在文化上它正在走向多元化，多种文化共存，互生互长。一个文化综合、融合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已经成为东西方学者们和政治家们的共识。

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机遇。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是多元性，这是在我们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多民族通过互相交流、竞争和斗争，从而达到互相融合的过程中而形成的。这种多元化一方面使得它具有宽容性，极大限度地接受外来文化要素，另一方面又能较容易地遗弃许多过时的文化要素。这种本质就使中国文化的弹性、柔性表现突出，从而也就适应性较强。总之，正是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质，使它在今天世界呼唤多元精神价值的时代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机遇。

尽管我们的文化潜力已经把我们推向21世纪人类命运的前沿阵地，但要迎接这种挑战，仍需要我们努力去搞好文化建设。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重塑我们的信仰体系。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成功地进行了一场社会改革或叫转型，这一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我们的文化建设还未跟上。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在物质丰富的同时在精神领域中的信仰缺失、道德弱化和物欲主导等方面。

重塑我们的信仰体系需要我们认真地总结历史，深入地研究现实文化生活，在人



民众中间寻找文化创造的活力之源。我相信，我们重建的信仰体系应该是一种多元成分有机结合的集合体，它应该包括：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它为人类世界的历史进程指明了方向。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西方后来的福利社会、工会力量。今天，我们仍然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解决我们社会的冲突和矛盾。而且，从更高一层意义来说，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大同的信仰作为趋势是不可动摇的。

——儒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是中华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元素。它的中心思想是通过个人修养实现理想状态的社会秩序。儒学成功地为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方式和维护个人尊严提供指导。

——佛学。佛学传入中国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与儒学与道学的交流互融中被中国化了，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普罗大众提供了人生精神世界终极命题(生与死)的可以接受的答案。汤因比先生指出：“在一个物质上统一起来的世界里，如果佛教是唯一传教的宗教，那么个人的选择自由将能得到保障。不幸的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没有佛教那种宽容传统。”

——西学。中国人对西学的态度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它填充了我们文化中刚性缺乏的一面。西学东渐300年，尤其是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西方文化已经浸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西学应该成为我们文化中的合理部分。

——道学。天人合一的道学是中华文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伟大思想，是对人类思想史的伟大贡献。在今天的时代，它显得尤其重要。实际上道家思想的精髓远不止于此，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凡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它对于我们认识世界与人生的终极真理尤为重要。

结语

历史的长河将中华文化推到了21世纪世界文明的中心舞台。5000年文化的锻造，使中华民族必然肩负起人类未来新文化的责任。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历史逻辑的指引，只能表明我们的文化特质具有肩负起新的人类文明的潜能，而要真正担负起这种历史责任，实现人类文明新的飞跃，仍需我们作出巨大的努力来建设好我们的文化。

首先，我们要将中国从一个文化大国变成文明强国。一个现代文明强国，是靠制度文化而不是行为文化来支撑的。而制度文化的最高层面就是政治制度或政治文明。今天，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将西方的文明和政治制度作为普世范式向东方推广是不可能的和不可行的。我们必须综合世界人类各种政治智慧，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适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大趋势的民主政治体制。这应是我们政治文明建设，也是我们迎接21世纪文化挑战的核心任务。

其次，文明强国建设必须全面提高全民素质，加强普通大众的文明意识教育。人的素质是多方面的，而其核心是对个人价值、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的认识。一个漠视他人价值和环境价值的人，首先是因为他无视自身的价值，是一种自我人格贬



低。21世纪是全球各种文明互相交流、交融、学习和促进的时代，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尽快完成从文化人向文明人的全面过渡。

最后，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世界观，站在全人类新文明的高度来审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一个崭新的世界文明将借助我们的文化躯壳在东方诞生。未来的世界既不是西方文明在东方的移植，也不是东方文明的简单复兴，而是两种文明以及更多其他文明的高度融合，集世界上一切文明的优点，建立的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让我们以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胸怀去拥抱21世纪的文化新时代。

(刘云德.光明日报,2011.8.29)

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在全球所产生的影响日益增强，有关中国形象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文学作为与社会文化既同构又超越的审美意识形态，在这一历史关节点上如何承担时代使命，发挥自己既塑造又传播中国形象的功能效应，这个问题已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关于中国的审美想象与建构，它通常包含他塑与自塑两部分。研究者历来关注比较多的是中国形象的他塑——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塑造，而对于中国形象的自塑几无系统而理性的观照。本文拟从塑造、传播与反思三个方面试作探讨。

一、中国形象的塑造：在镜与像之间

1. 中国形象的异质化问题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回望百年中国文学的中国形象书写，我们不能不看到异质化已成中国形象塑造的一种普遍症候。

第一，文化退让驱使下的委顿形象。在20世纪初的思想文化革命中，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外来文化被视为绝对优于本土文化而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不少作家借鉴了源自欧洲和日本的国民性话语来展开对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进行全面的质疑与否定。这种反思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始终，以至成为一种呈否定性向度的启蒙文学模